

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苏联剧变苏共垮台的原因

陆南泉 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摘 要：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走进了死胡同。人们在抛弃这个模式的同时，也抛弃了作为国家领导核心力量的苏共。这是因为，在斯大林体制模式条件下的苏共，长期不思改革，难以做到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应吸取的教训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理论，深化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先进性。

关 键 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苏联剧变；经验教训

作者简介：陆南泉，男，（193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根本原因或者说深层次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正如普京总统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1]之所以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斯大林—苏联社会模式自身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其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失去了信任。换言之，当这些国家人民看到世界发展的现实情况现自己的国家大大落后了，除了产生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那就只好抛弃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另社会发展道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

人们在抛弃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也抛弃了原来作为执政党与国家领导核心力量的共产党，这是因为，在斯大林的模式条件下的苏共，不思自身变革，因而难以做到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也难以应对时代的挑战，在方资本主义国家较量中败下阵来。

一、落后的粗放经济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

如何正确评价苏联经济建设的成效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是剖析苏联剧变、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人民是否拥护与信任你这个党和由你领导的政府，看你能否使他们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使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也是体现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可否认，经过70多年的发展，苏联经济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1937年，它的工业产值已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但是，评价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能只看量，更重要的应从综合的质的方面去分析。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评价苏联的经济建设，那末，完全有理由认为的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是不成功的，后来成为广大苏联人民不信任苏共、抛弃苏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关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国家。一些人常以此来证明苏联经济的优越性，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由于长期来苏联在发展经济方面实行片面的追求高速度的赶超战略，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是高的。战后到50年末，增长速度一般在10%左右，例如，1946—1950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4.2%，1951—1960年为10%。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大林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功效日益衰退，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即出现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并没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没有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从60年代起经济增长速度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详见下表）：

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其中1990年
社会总产值	7.4	6.3	4.2	3.3	1.8	-2
国民收入	7.8	5.7	4.3	3.2	1.0	-4

资料来源> 根据苏联有关年份国民经济资料编制。

这里要指出的是,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础上,靠一些临时性的因素达到的,这指的是靠当时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石油和大量生产与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达到的,[2]如排除这些因素,差不多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绝对额没有增加。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出现危机,导致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如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到1988年下降为64%。据俄一些学者分析,按人均计算1989年苏联的GDP为美国的30%,工业产值为43%,农业产值为3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苏联的实际GDP为美国的39.67%,人均GDP为34.96%。

2. 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没有改变。

苏联经济难以保证持续增长,并最后出现经济危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后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没有改变。就是说,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达到的,是一种拚消耗、浪费型的经济。

苏联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它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1961-1987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5.4%,基建投资为5.6%。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

70年代初,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扭转已开始出现的速度下降趋势与提高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经济发展由粗放向集约化。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由于整个70年代至80年代初,苏联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方取得进展,80年代又重新强调经济转向集约化的方针,1986年苏共二十七次又进一步确定“生产的全面集约化”、“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

苏联一直到1991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1-1.5倍。苏联集约化方针之所以未能取得进展,虽然有多种原因,但说到底,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因为一定的经济运行机制决定着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经济运行机制基本上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从微观经济层面讲,在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经营机制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的,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与适应性很差,投入多产出少的情况比比皆是;从资源配置层面讲,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由指令性计划决定的,这必然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并且长期难以调整,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再从宏观层面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方法是直接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间接的经济方法,这样也就排斥了市场的作用,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盛行,往往造成重大的政策失误和经济损失。

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决定了它的经济素质低和缺乏竞争能力。这个在苏联剧变前,由于它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在经互会国家范内进行,暴露得不很明显,但剧变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与原经互会国家经济关系急剧萎缩,同时又快速实行对外开放与外贸自由策,这使俄经济缺乏竞争能力的弱点一下子充分暴露出来,它的大多数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轻工业、食品工业很快被西方国家冲垮,现在需要重建。

3. 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

长期来,苏联实质上推行的是经济军事化政策,经济的发展战略、政策主要是为扩军备战和为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服务的。从斯大政开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的经济赶超战略,其核心是军事力量的赶超。这样的结果是,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速度难以平衡,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拉开,即由1966-1970年间的1.04:1扩大至1971-1980年间的1.28:1。在重工业内部,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部门发展更快,1971-1980年机器制造业产值增长速度要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1.7倍。苏联工业的80%与军工有关。与此同时,苏联农长期处于落后状态。1913-1953年,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其中谷物产量1953年低于1913年的水平。1979-1982年连续4年出现歉收。经济的军事化给苏联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在一些年份里,用于军事准备的开支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也就是说,比美国和欧洲北约国家的同类指标高出了4-5倍。”[3]“没有任何敌人能像军国主义化那样吞没一切,给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这是在面前犯下的罪行。”[4]

4. 由于受体制的制约,不能适应科技革命发展的要求。

苏联解体前,拥有科技人员150多万,占世界总数的1/4,每年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总数的1/3。这些科技力量之所以不能在发展生产上充分发挥作用,让其成为先进的生产力,除了因为苏联把先进的技术人才集中在军事部门、搞军备竞赛这一原因外,主要问题是受体制制约。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中说>“最令人不安的还在于,我们在科技发展上开始落后,”科技停滞“不在于缺乏科学成果,主要是国民经济接受新事物不积极。”长期来,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不仅不能加速科技进步,有时还会在科技进步的

上制造一种独特的“反促进因素”。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5]企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物资技术供应制度阻碍企业技术创新；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一直存在矛盾；物质奖励制度弊端甚多；产品供不应求，缺乏竞争；企业资金不足，阻碍设备更新；科技管理体制本身的弊病，突出表现在科研、设计、实验直到生产这几个环节的互相脱节。由于科技进步缓慢，在苏联解体前，机械化提高得很慢，生产中手工劳动比重一直很大，工业中从事人工劳动的工人约为1/3，建筑业占一半以上，农业则为1/4。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总体来说，科技水平要相差15-20年。

二、理论教条、文化专制，不代表先进文化

由于在理论领域“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在苏联占统治地位，加上个人崇拜盛行，使苏联长期缺乏理论创新，从而窒息了党内和学的创新精神。下面仅从苏联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这一领域作些分析。

苏联根据自己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把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象征，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把生产资料化程度越高越先进，工业全盘集体化，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等，都写进了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政治经济教科书》中。这中体现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内容，后来，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事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体制模式，如果偏离这个模那就是社会主义异己，是修正主义。1948年斯大林批判铁托就是一例。

斯大林致南共和铁托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者来说这是不容许的”。[6]到了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发现搬用斯大林体制模式出现种种问题后，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后来60年代又悄悄地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的传统理论、苏联确定的“共同规律”控制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亦是力图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又遭到了苏联的镇压。

斯大林把苏联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及把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看成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式，并上升为“共同规律”，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并让所有执政的共产党奉为必须遵守的圣典，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在这个问题上，斯是这样讲：“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7]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经常成是经常变化的改革的社会。”[8]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时就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9]也如邓小平同志后来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0]他还说：“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1]

苏联模式的僵化，首先是理论僵化的结果。纵观苏联经济体制形成、发展和改革的历史，就可十分清楚地看到，产品经济观一直占地位，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一直批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特别要指出的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是在勃涅夫执政时期，批判的主要特点是，常常挥舞政治大棒，与反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当时在报刊发表的文章说：“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阶级的“邪说”，它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实际上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说：“市场社会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来“冲跨”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12]主张更多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学阿甘别基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等，成为围攻的对象，并被迫使远离莫斯科去新西伯利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把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内容纳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3]可以说，在经济科学方面，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在走回头路，集中精力在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切实际地去拨弄从马列主义奠基人著作中摘出来的一连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们最粗俗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诠释来研究。[14]这大林式的让释，早已成为被推销得贬了值的理论，还在强迫人们接受。理论的停滞和倒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是社会经济的停滞时期，是苏联积聚危机因素、极大地消耗苏联各种潜力、苏联走近衰亡的关键时期；二是出现了重新斯大林化；三是出改革的严重倒退。1965年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时经常使用“改革”一词，但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了，而改用“完一词。改革的停滞，使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僵化和“成熟化”，从而使今后的改革更加困难。

苏联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一年，经过激烈争论，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才从“计划—市场经济”到“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最后发展到“市场经济”。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政府独立执政，这时，尽管各政治派别与学术界在不少问题上有纷争，但经济转轨总方向问题上已达成共识，普遍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东西”，令市场经济是人类在经济运行方面所取成果，不应拒之门外”。结论是：“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

应该说，苏共对待商品经济、货币和市场问题上，最为典型与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理论不能与时俱进的落后状态，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严重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苏联从斯大林1953年去世一直到其解体，经过了38个年头断断续续的经济体制改革，但历次改革都在以产品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因此，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

从苏共发展的历史来看，之所以在理论上不能创新、与时俱进，与苏共长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有关。文化专制主义突出表现在：党

高领袖对真理拥有垄断权，其言论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允许有任何疑问，更不允许发表不同的看法。最高领袖的理论，是党和国家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据，只要其在位，就绝对正确；最高领袖代替所有人思考，成为各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裁决者。与此同时，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表现为谁权力大谁掌握的真理就多；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对持不同观点的人动辄扣政治大帽子，进行“批判”，许者遭逮捕、被非法审讯、被送进劳动营、精神病医院甚至枪决；对人类历史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往往加以排斥与否定，实行极其严格的检查制度。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者的职责只能是赞扬和吹捧领导人，只能是领导人著作与言论的诠释者。

三、许多重大政策违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之后，最主要的精力应该用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历史来考察，苏共取得政权特别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推行的国内外政策，往往是为实现霸权主义政策与巩固党的统治地位服务的。这我们撇开斯大林时期滥杀无辜、使一个2亿人口的国家有2千万人遭到无辜镇压的史实，我们也撇开苏共党的严重官僚化、扩大自己特权离人民的实情，仅从经济、生产目的这一角度简要分析一下，苏共为何不能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由于苏联长期把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置于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备之下，这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生产、人民消费的发展，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难以提高。因为，苏联经济实力的水平，它做不到“既要大炮又要黄油”。长期来，苏联市场紧张，社会主义经济一直被称为“经济”。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在1914年结婚时才20岁，因为我做的是高度技术性工作，我立刻得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有会客室、卧室和餐厅。革命后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心。”[15]1950年苏联居民年均肉消费量比1913年少3公斤，粮食少28公斤。[16]1952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所购买的食物数高于苏联3.6倍，美国则高于5.5倍。[17]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多。”[18]由于苏联军备竞赛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时期，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1990年，在12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到苏联发生剧变的1991年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奈娜回忆起1991年随叶利钦访问德国的情况时说：“当时他们应邀参观市场和路旁的店铺，那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使她想到了俄罗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况，羞愧得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心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计划，但是，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呢？”[19]据西方学者估计，如果苏联把它的军费预算削减25%的话，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的增长率几乎可增长1倍。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了由斯大林亲自审定、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下的、年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定义。一个是基本经济规律，教科书引用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958年修订的第三版的定义有所修改，定义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点就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们得到全面发展。”这里把最大限度地满足改为充分地满足。事实表明，苏联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满足实行扩张政策的扩军备战的需要，广大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一直不是放在发展生产的目的上，既谈不上最大限度也谈不上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这种经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苏共不可能成为人民根本利益代表，从而也就更谈不上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几点启示

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苏联剧变的分析，以下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1.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先进性。

长期以来，苏共没有通过体制改革来推动自身的变革，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影响苏联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发出下令停止苏共活动的法令时，几乎没有苏共党员和苏共支部出来抗争，这足以说明苏共党内的机制十分不健康，广大党员对党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对党失去了信任。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基塔连科于1991年9月访华的一次采访中说的：“苏共垮了，从领导人看是必然的，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多数老百姓不信任他们。”要使人民信任就得通过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先进性，保证党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不至于使错误的政策长期存在并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同志接着还讲：“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20]

2. 加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活跃理论的探讨，推动理论的创新。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大规模进行之前，提出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接着又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这种思想上的解放对经济体制改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后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明显出现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不适应”现象。这种情形没有很大的改变。我认为，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切实做到邓小平提出的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

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应该说，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必须坚持进行改革，因为，正如邓小平讲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1]十分明显，如果政治体制改革长后，民主化进程缓慢，必将影响理论的创新所需要的政治环境。

3. 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对我国深化改革具有特殊的意义。

苏联垮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要向前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而推进改革就必须有理论创新，而要做到这些，必须坚持反“左”与反教条主义。这是因为：第一，在我国，僵化的教条主义仍有不小的市场；第二，随着改革深化必然产生大量新问题，因此，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在理论上有个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替惕、不防止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必将给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困难；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实际情况告诉人们，“左”的教条主义一直是主要错误倾向，一直存在着“左”比右好的错误认识。

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及时地总结我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及时发现问题，根据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认真研究。研究问题、寻觅问题答案时，决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与结论；二是特别要重视科技的新发展，要充分估计到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往往是超出人们的想像。在这种条件下，死抱住几十年、上百年的前论，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当今社会，党的理论也不可能革新，从而必然失去其先进性；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该充分考虑与吸取原本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权力制衡、公正、人权、自由等）。十六大报告也谈到，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改革，如不充分利用全人类共同文明的成果，这同样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失去先进性。

4. 从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更需要理论创新。

邓小平同志是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这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共运讨论